

社會發展的趨勢與挑戰

香港與台灣的經驗



劉兆佳 尹寶珊 李明堃 黃紹倫 編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社會發展的趨勢與挑戰 香港與台灣的經驗

劉兆佳 尹寶珊
李明堃 黃紹倫

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2006

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叢刊第六十七號

社會發展的趨勢與挑戰：香港與台灣的經驗

編者：劉兆佳、尹寶珊、李明堃、黃紹倫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地址：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印刷：藍馬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二零零六年六月第一版

國際書號：ISBN-10: 962-441-567-6

ISBN-13: 978-962-441-567-4

© 香港中文大學 2006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序

清政府因戰敗分別於1842和1895年把香港、台灣割讓予英國和日本。歷史的弔詭反令這兩個殖民地率先踏上現代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在二次戰後締造經濟的奇蹟，分享「亞洲四小龍」的美譽。

新中國成立後，台海兩岸一直處於軍事對峙狀態，但隨著冷戰結束，雙方亦不能自外於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內地於1970年代末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強調經貿合作，擱置政治分歧，兩岸關係始出現鬆動。台灣於1987年結束動員戡亂時期、開放民眾赴內地探親、放寬外匯管制，以及1990年准許台商與內地從事間接經貿活動後，兩岸三地旋即基於優勢要素互補而發展出相互依存的經貿關係。在兩岸尚未直接「三通」的情況下，香港仍穩具特殊優勢，擔當華人社會政經交流的中介樞紐。

台港關係一直處於政經分割的狀態，受到兩岸關係的嚴格制約。在社經領域，兩岸關係緩和帶動了台港經貿活動的迅速發展，台灣對香港貿易總額從1986年的3,294.4百萬美元，躍升至2004年的31,971.5百萬美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5b）。目前，香港是台灣第二大出口地、第三大貿易伙伴，而台灣則是香港的第四大貿易伙伴（新華網，2005）。隨著台港貿易依存度的提高，兩地民眾的往來亦愈趨頻繁，香港訪台人數由1986年的245,859人次，增加至2004年的315,439人次；同期，台

灣赴港人員也從37,949人次激增至2,327,489人次（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5a）。

然而，在政治領域，北京自始便對香港的涉台事務表達明確立場，如在1950年代周恩來向港英政府提出的三點聲明，¹ 1990年代國務院宣布的《中央人民政府確定的處理“九七”後香港涉台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政策》（俗稱「錢七條」），更宣示了北京對台港關係的主導地位。² 香港回歸中國令台港政經分割的關係更形彰顯，台灣的《香港澳門關係條例》雖確保了台港關係的平穩過渡，但兩地的互動免不了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和環境。目前中國內地、台灣和香港之間，存在微妙而複雜的關係，台港兩地都有意迴避官方接觸，只讓民間一如以往保持多樣而頻密的交流。

對台灣、香港兩地作出比較研究，並不新鮮，以前已經有過這方面的探討。隨著兩地關係的不斷演變，這種比較研究自然還要繼續和深化。事實上，這些跨地域研究兼具學術和政策意義。

以學術意義而言，台港同文同種，都經歷過一段殖民歷史，而目前經濟發展水平相若，這些因素都為比較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另一方面，兩地民主化的步伐因受制於不同環境而先後不一，各自享有的國際活動空間也截然不同，這方面的下一步發展存在著相當多目前難以預料的因素，為學術界提供了範圍廣闊的研究空間和需要深入探討的具體課題。

至於政策意義，主要是在全球化的時代，區域化已構成一股難以抗衡的趨勢，在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示範作用下，亞洲各國亦在進行不同層次和規模的區域合作，中國內地在其中佔舉足輕重的地位。³ 香港經歷亞洲金融風暴的挫敗後，朝野已達成共識，重新定位，積極融入內地經濟體系。香港歷來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如何和區域內的其他成員保持往來並取長補短，是必須面對的問題。台灣的處境和政情與香港迥異，受政治原因的影響，對於參與區域化有較大的困難或抗拒，但台灣如不參與本區域的協作，便有被邊緣化的危險。在目前

「三通」一時未能落實時，加強台港之間的溝通、瞭解和互動，不失為推動區域化的一個可取的著力點。這當中涉及諸多問題，既要政府主動面對，也要民間廣泛關注。

2000年，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與台灣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開始一項長期的合作研究計劃，就雙方關注的香港和台灣社會政治問題，進行定期的社會意向電話調查。2004年9月，香港亞太研究所、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以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合辦了第二屆「社會意向與社會指標研討會」，出席學者共發表了17篇學術論文，廣泛介紹和比較香港及台灣的相關發展經驗，當中部分論文就是根據上述的社會意向電話調查結果而撰寫。本書收錄的，是會上發表的16篇論文，對於全球化與社經發展、價值取向與生活實踐、政府管治、社會信任、社會排斥、族群關係、社會問題，以及社會衝突等議題，提供了實證的數據和深入的分析。

香港政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屬下的研究資助局資助1995至2001年的香港社會指標調查（研究計劃項目編號：CUHK2/93H、HKU394/96H、POLYU5185/98H和CUHK4331/00H），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資助台灣學者出席上述研討會的旅費、香港寶業集團主席劉尚儉先生慷慨贊助香港的社會意向電話調查，以及本書的出版，我們對此深為感銘。伊慶春、章英華、傅仰止和瞿海源等教授積極推動歷次社會意向電話調查，特此致謝。最後，香港亞太研究所的姚傳禮、陳韻晴、梁月蓮和莫錦華協助問卷調查、數據分析和論文文稿校對等工作，在此謹誌謝忱。

編者

2006年5月

注釋

1. 其中第二點是不容許敵對勢力和親台反共人士在港從事顛覆北京政權的活動。

2. 其中第六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台灣地區之間以各種名義進行的官方接觸往來、商談、簽署協議和設立機構，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或經中央人民政府具體授權，由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1995）
3. 如東盟與北京於2002年簽署協議，擬於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參考書目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1995。
《中央人民政府確定的處理“九七”後香港涉台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政策》，6月22日（<http://www.fmccprc.gov.hk/chn/yglz/jbzc/t44883.htm>）。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5a。「臺港澳往來人數統計表」（http://www.mac.gov.tw/big5/statistic/ass_hm/table8.pdf）。
- 。2005b。「臺灣對香港貿易統計表」（http://www.mac.gov.tw/big5/statistic/ass_hm/table1.pdf）。
- 新華網。2005。「香港舉行紀念江澤民《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發表十周年座談會」，1月31日（http://news.xinhuanet.com/taiwan/2005-01/31/content_2532018.htm）。

目錄

序	vii
---------	-----

第一部分：全球化與社經發展

檢驗全球化城市的社會兩極化論：1990年代後的香港 趙永佳、呂大樂	3
--	---

台灣性容忍態度的結構背景：人口組成、都市性與 全球化效果 伊慶春、傅仰止	41
--	----

彈性就業在香港的發展 譚若梅	63
-------------------------	----

第二部分：價值取向與生活實踐

核心價值：香港社會指標研究的啟示（1988-2001） 黃偉邦	99
--	----

香港人的幸福觀 張燦輝、尹寶珊	115
--------------------------	-----

香港兩性的社會網絡特徵與生活快樂 陳膺強、李沛良	139
-----------------------------------	-----

第三部分：政府管治與社會信任

香港特區管治模式

何國良	155
-----------	-----

台灣民眾的政黨認同、體制信任與對社會政經狀況 的評估：2000-2003

瞿海源	177
-----------	-----

台灣社會的信任變化：1985-2000

楊文山、范維君	217
---------------	-----

第四部分：社會排斥與族群關係

人離鄉賤？：香港外籍家庭傭工狀況調查

趙永佳、李子樂	247
---------------	-----

身體、衣著和文化排斥：巴基斯坦女性在 「國際」香港的經驗

古學斌、陳錦華	277
---------------	-----

台灣原住民的弱勢意象與位階：比較我群與他群觀點

傅仰止	305
-----------	-----

社會距離態度反映的族群關係：台灣資料再探

章英華、伊慶春	341
---------------	-----

第五部分：社會問題與社會衝突

轉變中的香港人口問題

鄭宏泰、黃紹倫	373
---------------	-----

階級與福利國家：香港的經驗

王家英、王卓祺、莫邦豪	401
-------------------	-----

台灣與香港的環境抗爭：1987-2002

蕭新煌、尹寶珊	423
---------------	-----

編者、作者簡介	451
---------------	-----

索引	453
----------	-----

第一
部
分

全球化與社經發展

檢驗全球化城市的社會兩極化論： 1990年代後的香港

趙永佳 呂大樂

前言

全球化城市發展與社會兩極化之間有著強烈關係的論點，是城市社會學中的一個熱烈討論的話題，單是檢驗這一論題的正確性的討論，便已積累了不少文獻。大多數此類研究文獻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西方先進城市或地區，如倫敦、紐約等（Sassen, 1991, 2001; Hamnett, 1994）。Baum（1997, 1999）的研究報告是極少數將分析延伸到北美及歐洲大陸以外的例子之一。本文作者將嘗試通過驗證香港這個於倫敦、紐約、東京軸心以外而又差不多是一致公認的全球化城市的個案，來介入當前相關的討論。由於香港明顯地經歷了全球化城市文獻中所假定的重大轉型，即第二產業迅速減少，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producer services）的迅速擴張，因此，香港是檢驗這種所謂的二元城市論（Mollenkopf and Castells, 1991）的理想個

案。如果社會兩極化確實是全球化城市發展不可避免的結果，那麼香港也應該不會例外。香港的經歷還可清楚地顯示移民及外來工在社會結構成型中的角色，就如倫敦和紐約的典型情況一樣。本文所採用的是人口普查中的微觀資料，而不是已公開發表之經過整合的數據，因此，在檢查全球化城市中結構變化和職業變化與社會兩極化之間的關係時，更能直接地切合分析與檢證的需要。

全球化城市論與社會兩極化

社會兩極化與全球化城市之間的關係自1980年代以來就被推到了社會分析的的前沿。Sassen (1991, 2001) 和Friedmann等學者 (Friedman and Wolff, 1982; Friedmann, 1986) 已經清楚及有力地說明了「全球化城市」或「世界城市」論，並藉此捕捉世界經濟向全球化加速和不斷整合的過程中所出現的結構轉型。正如Sassen (2000:4) 所指出的一樣，當今的全球化城市是：

(1) 世界經濟的指揮點；(2) 當前主要產業——金融及為企業提供的專業服務——的主要所在地與市場；(3) 為此類產業（包括其創新活動）之生產程序的主要地點。

全球化城市論中最有趣且最具爭議的一點是，它們作為「後工業生產基地」，而且金融與生產性服務在主要城市中之重要性日益提升，這對它們會造成怎樣的影響；這就是所謂的兩極化論。Friedmann和Wolff (1982:320) 對此有中肯的見解：

世界城市的首要事實在於其就業結構初期之變化給整個經濟及人口結構帶來了的衝擊。世界城市的經濟動力主要是由於高層商業服務的增長，並雇用了大量專業人員（跨國精英）和輔助文職人員所致。

與此高層商業服務相關的其他就業部門亦同時有所增長。一個是迎合這批新的商業專業精英的個人服務（包括飲食、酒店、

豪華服裝店、娛樂、房地產、家庭服務與安全服務等）。另一增長的產業是國際旅遊業務與政府服務。

所有這些產業界別及職業發展趨勢都被認為對社會平等及收入分配會產生負面的影響。Sassen (1998:137) 精要地將兩極化論總結為三個動態過程：

- (1) 不同經濟產業獲利能力的差異與不同類型工人賺錢能力的差異不斷擴大；
- (2) 服務業之組織本身及其雇傭關係轉為採用臨時工制，這導致兩極化趨勢的出現；
- (3) 城市邊緣性 (urban marginality) 之構成乃基於經濟增長中所出現的新的結構性轉變，而非舊有活動衰落所致。

在全球化城市中，「階級的兩極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跨國精英與低技術勞工的收入存在巨大差異，大量由農村及國外湧入之移民，及工作結構之轉變。」(Friedmann, 1995: 324) 就業的擴張傾向於集中在職業或收入分配的頂層和底層，而非中間的部分。這是去工業化及服務業的擴張所引致的現象。製造業職位中的中層收入工作，改由相對地工資較高又或者極低工資的二元化服務業工作所代替。Sassen (1998) 也指出，勞動市場下層的雇傭狀況出現更多招用臨時工的情況，而在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中，工作的不穩定性和雇用兼職工都變得更為普遍。新興的服務型經濟也在對學歷和技能證書的要求上出現了兩極化的情況。低層的工作通常由邊緣勞工所擔任，他們多是來自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的合法或非法移民。Sassen (1998) 稱此為服務業編制的二元化。也有人以「沙漏」(hour glass) 的意象來描述全球化城市的社會結構 (Marcuse, 1989:699)。

兩極化論引來不少批評（參考Hamnett, 1994, 1996）。在後來的辯論中出現了幾個對確定該論題正確性的相當重要的論點。首先，Sassen所提出的觀念模糊不清，定義鬆散。為了檢驗是否存在兩極化的情況，我們需要區分相對性與絕對性的兩極化，即兩極化是意味著職業分級中頂層與底層之間的差距

擴大，還是意味著全球化除了增加專業及管理工作外，還會帶來更多低技術或低工資的工作。換句話說，兩極化應與較廣義的社會不均概念區別開來（參考OECD, 1993; Burgers, 1996; Kloosterman, 1996）。¹ 此外，還需要調查的是：究竟兩極化主要表現於職業結構的變動？還是在收入方面呈現出兩極化的趨勢？第二，兩極化論被指為與有關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職業結構變化（尤其是專業化與新中產階級抬頭）的文獻有所矛盾。第三，對於該論題是否可以普遍應用於其他先進國家之上也存在疑點，因為它的分析主要繫於紐約和洛杉磯的經歷，而在這些城市中，大量的移民令服務業二元化和轉為雇用臨時工的情況較其他地方更為廣泛。因此，一個較普遍的議題是，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兩極化是全球化所導致的經濟重構的後果？又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兩極化是會受到地方層面的制度因素（如移民政策等）所影響呢？最後，還有一個性別的議題：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在全球化城市中日益擴大的不均現象是跟性別有關的？

Hamnett (1994) 通過荷蘭Randstad區域的實證研究來驗證該論題。他的調查結果顯示，該地區社經變化的主要方向是專業化而並非兩極化。Burgers (1996) 考慮了失業人口因素後，指出荷蘭四座城市中存在兩極化的趨勢。Kloosterman (1996) 以荷蘭的兩座城市為研究對象，同樣也指出了這一點。Baum (1997, 1999) 分析了悉尼及新加坡兩座亞太地區城市的情況。關於悉尼，Baum (1997) 發現了兩極化的證據，而當在分析中包括了性別和移民因素時，這尤其明顯。但就新加坡的情況來說，他則認為「與兩極化結構發展相反的是，這裏的趨勢是出現一個走向專業化的職業結構，以及一個正在增長中的中高收入群體。」(Baum, 1999:1095)

本文試圖通過觀察亞洲另一座全球化城市來介入目前關於全球化城市的實證研究。香港的例子是值得參考的，這不僅僅是因為香港經常出現在世界城市或全球化城市的名單之上（參考Friedmann and Wolff, 1982; Beaverstock et al., 1999; Taylor et al., 2002）。由於香港在地方層面的制度性安排十分特殊——即經濟主要由自由市場力量驅動，因此，全球化對它的影響（去工業

化和相應發生的產業結構變化)更為顯著。換句話說,與其他經常被引為例子的城市如紐約、倫敦或者東京相比,香港乃檢驗全球化城市分析的理想案例。此外,我們將力圖通過1991、1996及2001年的人口普查微觀資料來超越先前有關兩極化論的檢驗。基於這樣的微觀資料,我們便可以就香港過去十年全球化城市發展進程中所表現出的兩極化趨勢,以及其與結構和職業變化之間的關係提出更仔細的分析。

全球化、去工業化及生產性服務的擴展

香港從十九世紀成為殖民地時開始,便介入了全球經濟。它扮演著區域貿易港口和商業城市的角色,在二十世紀早期海外華人資本經濟網絡中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Hui, 1996; Hamilton, 1999:23; Meyer, 2000)。1950年代,香港的製造業發展進入了新階段,其後再在1960至1970年代通過擴展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成功及快速地發展為一個工業城市。從1960年代後期開始並成為了地區金融中心(Jao, 1997:39)。至於香港經濟是如何崛起的經過,已是耳熟能詳的故事了(關於香港的經濟發展,參考Chiu et al., 1997)。

但是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化城市的經歷還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香港故事的後半段是關於香港在經濟不斷走向全球化進程中所經歷的經濟和政治重構,以及1997年結束殖民管治和回歸中國的重大轉變。在經濟方面,香港通過製造業大量北移而大大地擴展了本地生產的能量,是香港工業進一步走向全球化的一個新階段。受到高生產成本(勞工與土地)及來自其他新興工業經濟體激烈競爭的影響,本地製造商早已開始在海外尋求新的發展空間(Lui and Chiu, 2001)。從1980年代中期起,生產外移成為了香港製造商的主要生產策略。雖然許多香港製造商將廠房遷移到諸如東南亞、斯里蘭卡、毛里求斯,甚至遠至波蘭等地,但是香港境外生產的主要基地基本上還是集中在擁有廉價土地與勞工供應充裕的中國內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區)。該地區之生產條件正符合香港製造商那種不用經過重大技術更

新與提升便可擴展生產的經營方法 (Lui and Chiu, 1993; Chiu and Lui, 1995; Tuan and Ng, 1995)。

官方資料顯示，在1985至1999年間香港資本（共計804.738億美元）佔珠三角地區所有外商投資的70.8% (Enright et al., 2003)。另一統計估計則顯示，本世紀交替之際，香港在廣東雇用的工人數目是在香港所聘請的工人總數的26倍。由此推斷，香港企業在珠三角地區雇用的人數估計達1,000萬至1,100萬 (Enright et al., 2003)。香港工業總會在2002年的一項研究也估計，在內地約有25,000家香港製造公司和貿易公司，而另有34,000家工廠作為分包商或供應商為香港製造商服務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 2002:5)。

香港角色的轉變 — 從製造業之生產地點，轉變為協調及管理廣大境外生產的營運中心 — 還帶來了另外一些變化。首先，來自內地的再出口貿易成倍增長。由於香港製造商通過在內地設立工廠，或將部分生產外判給內地工廠來處理生產程序，因此外發加工安排的數量急劇增長。外發加工之安排通常是將原材料或半製成品由或通過香港出口到內地加工，然後通過合約安排再將加工的產品重新進口到香港。在1991至1994年間，含外發加工性質的中國原產地產品轉口從2,214.5億港元倍增至4,225.4億港元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95:F2, F7)。

跨境貿易及其他相關交易的增長刺激了生產性服務業的增長，這包括了在內地進行擴大生產而需要的融資活動，以及與貿易相關的服務、保險、通訊、港口、運輸和物流管理等不同方面 (Tao and Wong, 2002)。如上文所提及，過去20年中國經濟開放影響了香港經濟結構之轉型，中國重新加入全球經濟推動了香港經濟的社會空間結構的轉型。由於南中國為香港的製造業提供了充裕的土地和勞工資源，並成為了香港的腹地，香港經濟於是進入了一個都會化 (metropolitanization) 的進程 (Wong and Tao, 2000:51)，在趨向一體化的珠三角區域經濟中扮演新的角色。從這一點來看，香港作為全球化城市顯然是受